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姜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新诗研究丛书)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I 新... II 姜... III 新诗 诗歌史 研究 中国 IV 中国 文学 知识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000 号

书 名：“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著作责任者：姜 涛 著

责任编辑：高秀芹

标准书号：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陈丹青

网 址：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电子信箱：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电 话：邮购部 陈丹青 发行部 陈丹青 编辑部 陈丹青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陈丹青

定 价：陈丹青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目 录

序.....	温儒敏(员)
导言 研究方法、对象的提出	(员)

上 编

第一章 “新诗集”与新诗传播空间的生成	(员)
第一节 从书信到成集 新诗传播空间的形成	(员)
第二节 支撑诗坛的“新诗集”	(员)
第三节 公共传播与现代的诗歌想象	(猿)
第二章 读者、时尚与“代际经验”	(源)
第一节 新诗读者的构成	(源)
第二节 作为阅读时尚的“新诗集”	(缘)
第三节 “代际经验”中的《女神》	(缘)
第三章 “新诗集”出版与新诗坛的分化	(远)
第一节 “新诗集”与“新书局”	(远)
一 《尝试集》序列与亚东图书馆	(苑)
二 《女神》与泰东图书局	(苑)
第二节 由诗集出版看新诗坛的场域分化	(苑)
第四章 “新诗集”与新诗的阅读研究	(愿)
第一节 读者分类与新诗的“读法”问题	(愿)
第二节 对三本诗集的讨论 从“读法”的角度	(员)
一 为胡适改诗 胡怀琛的“读法”	(员)
二 “选本”中的新诗评价 读者的眼光	(员)
三 从《三叶集》到《女神》	(员)

下 编

第五章 “新诗集”对新诗呈现(一).....	(圆园)
第一节 胡适新诗构想的三个层面	(圆园)
第二节 《尝试集》对“新诗”的塑造	(圆园)
一 序言与编次：“诗体解放”的定位	(圆园)
二 成集中的“自我净化”	(圆园)
三 题名：“尝试”申说	(圆园)
结语 “新辑逻辑”中的新诗	(圆园)
第六章 “新诗集”对新诗呈现(二).....	(圆园)
第一节 胡适眼中的“新诗集”	
——以《草儿》、《冬夜》、《蕙的风》为中心	(圆园)
第二节 “诗话语”的凸显：《冬夜》、《草儿》序言的	
考察	(圆园)
第三节 选本中的新诗想象 对“分类”的扬弃	(圆园)
第四节 《女神》成书与新诗的重塑	(圆园)
一 从日本到上海 作为出路的“新诗”	(圆园)
二 《女神》编次中的“自我定位”	(圆园)
第七章 论争中的“新诗集” 新诗合法性的辩难	(圆园)
第一节 《评 尝试集》——学衡派的反动	(圆园)
第二节 《蕙的风》的论争——对一桩旧案的重审	(圆园)
第三节 《湖畔》与“经验范围”的争议	(圆园)
第四节 对“新诗集”的整体性批判	(圆园)
第五节 “新诗”与“诗” 合法性辩难的展开	(圆园)
第八章 “新诗集”与新诗历史起点的驳议	(圆园)
第一节 作为新诗合法性起点的《女神》	(圆园)
一 最初的接受：“诗美”的满足	(圆园)
二 “激情”的解释 抒情本体的确立	(圆园)
三 诗人形象 特殊人格的追寻	(圆园)

四 从“近代情调”到“时代精神”.....	(四九)
第二节 新诗史上的《尝试集》和《女神》.....	(四九)
一 从“共时”的对峙到“历时”的进化	(四九)
二 张力结构的消除 新诗发生历史线索的形成	(四九)
结语	(四九)
参考文献	(四九)

序

温儒敏

姜涛的这篇论文重新审视了“新诗的发生”这个课题。本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题目,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已经不少。翻开许多现代文学史,或者新诗史著述,所看到最多的还是对新诗发生发展轨迹的勾勒,诸如草创、奠基、拓展、衍变、高潮、深化等等阶段的划分,就成为描述新诗演进过程的一种常见的“叙事策略”。尽管在这种进化描述中也会注意到不同的诗歌流派之间的互相扬弃、递进、交错与组合,但研究者一般都还是相信诗歌的演化总会依照一定的规律,曲折地顽强地向着某个理想的审美目标趋近。这种线性叙事对于文学史知识的积累传授可能比较实用而奏效,但在获得历史叙述清晰感的同时,也往往忽略了文学史上共时情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于像诗歌创作这样格外依仗个性、灵感等偶然因素的文学现象来说,线性描述和规律抽取的方式就会牺牲更多“文学的丰富性”。

姜涛这本书也是谈“新诗的发生”,但多了一些对线性勾勒“盲点”的警惕。该书绕开那种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套路,除了对新诗的历史与审美的研究,又特别引入所谓“文学经验研究”的讨论,譬如新诗的结集、出版、传播、阅读的环节,及其在新诗“合法性”建立中的作用。该文重点考察了新诗“结集”对于现代诗歌如何形成气候,如何站稳脚跟的实际作用,其中有关新的诗歌阅读行为的培养形成,以及缠绕其间的历史复杂性,论者都有许多新的发现。这些讨论的意图是尽可能回到新诗发生原初的现场,从共时的层面展现错杂、丰富的历史样貌。

该书不是完整的新诗发生史,作者的目光集中在“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就是要以新诗如何结集、出版、传播、阅读等等现象的考察,来讨论新诗发生的复杂机制,包括其背后容易被人忽略的许多文学社会学

因素。当我们从书中读到新诗自我建构和扩张背后的许多复杂的“事件”，了解新诗的成立除了自身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变革，还有赖于在传播、阅读及社会评价中不断塑造自己。新诗的发生不止是新诗的创作，也还有新诗对阅读空间的开辟、读者的“训练”，以及“新诗经典”的打造。这样，我们就会对以往所获得有关新诗发生“常识性”历史想象提出质询。能够引发这样的质询，正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这种质询不但丰富了对现代文学产生历史过程复杂性的认识，也可能启发我们反思以往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开启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和新的思路。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来说，能够达到这种创新的“境界”实在不容易，也实在可喜。

现在有关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出版很多，但大部分都是套路雷同。有的书只要翻开目录看看就知道，其切入的眼光与提出问题的框架到底是否在创新。我的经验是，那种观点排列齐整讲究，线索描述流畅清晰的文章，可能是中规中矩的“好文章”，却不见得是真正有创意有见地的论作。文学史研究适当保持一点“模糊性”，多关注“常识”所可能掩盖的特殊性，多一些反思与质询，也许更能接近真实。

这本书所讨论的“新诗的发生”，也引起我一些联想。我想起三年前，在南京参加关于“现代文学传统研究”的学术会议时，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貌似普通的问题，竟引起热烈的讨论。我提的问题是：设想一位从事现当代文学的学者，自己是喜欢新诗的，但是如果他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要培养孩子读一点诗，不用说，也会是李白、杜甫、王维等等的古诗，而不大可能让孩子去念新诗。这是为什么？会上大家谈到许多原因，包括艺术形式、审美习惯、对于经典的崇拜，等等，但较少注意最常见的文学社会学的原因，譬如“阅读行为”的养成，传播方式，以及新诗和旧体诗的“功能”差异问题，等等。新文学所造就的普遍的审美心理、阅读行为和接受模式，显然都是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诗虽然也有追求格律和音乐性的，但已远不如古典诗词和音乐的联系那样密切。旧体诗的欣赏有赖吟唱，不加诵读，那韵味就出不来，这就决定了旧体诗在接受心理与阅读模式。而新诗则似乎主要是“看”的诗，依赖吟唱和朗诵是越来越少了。这种以“看”为主的阅读行为模式，反过来也会

制约和影响到新诗的艺术发展。如果这种看法成立,那么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现代文学学者也习惯于让孩子“诵读”古诗,而不是“看”新诗了。也许孩子到了高中和大学,又会有一段特别迷恋新诗的时期。这其中也有文学社会学的因素。对诸如此类现象如果不满足于做一般的推论,而是运用文学社会学与文艺心理学的方法,对新诗的得失以及作为“传统”在当代的延伸,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深入探讨,我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姜涛原来是清华工科的学生,因为喜欢写诗,转入清华和北大的中文系先后读硕士与博士学位。他具有较高的文学才华,又有创作实践,对“新诗生产”的复杂性也有切身的了解,这些都有助于他深入探讨这样一个涉及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课题,并取得成功。他的这篇博士论文答辩时获得评议专家的高度评价。作为导师,我在与姜涛讨论这个课题时也学到不少东西。我真心希望姜涛能够再接再厉,写出更多能体现新一代学人锐气和识见的学术论作。同时我也非常乐于向读者推荐这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二〇一〇年 圆月 圆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导言 研究方法、对象的提出

—

在现代文学研究中,新诗研究一直是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时期以来,出于对单一政治标准的反拨,在探究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下,对新诗史上众多备受争议的流派的挖掘、整理和重新评价,应该说是新诗研究兴起的起点。一批学人突破禁忌,通过细致资料搜集、作品分析,首先使被尘封的新诗历史重新浮现出来。当“平反”式的讨论渐趋沉寂,对新诗的审美追求以及新诗史内在线索的关注,便上升为研究的主要动力。在资料挖掘的基础上,新诗的流派构成、潮流演进、内部传承、外部影响、代表性诗人、理论批评、历史脉络等问题,都得到了细致的探讨。尤其是有关“现代主义诗潮”的探讨,更是新诗研究中着力最多,成果最丰硕,显露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以流派研究为框架,以语言、形式、观念问题为核心,以中西融合的现代追求为理想的讨论模式,已成为新诗研究的一个主导性的“范式”,潜在地支配了大多数研究的展开,其最终指向的,是完成对新诗历史的完整构想:它被描述为一幅由多种流派的彼此交错构成、具有内在的独立展开线索的动态图景。^{〔1〕}

“范式”的存在,使得新诗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1980年来,新诗研究在现代文学的学科格局中,自成体系,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问题和框架。然而,在取得丰硕成果,获得自足性的同时,还应注意的是:“范式”的稳定,或许同时带来了某种封闭性。一个突出的表征是,虽然相关的研究在不断推进,课题也在不断细化或深化,但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之外,内在的超越和突破,却很难获得。近年来,有关新诗的论文数量仍在增加,但视角的单一、方法的陈旧,以及观点雷同、材料重复所造成的“拥挤”,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其他领域的文学研

究不断拓展边界、重置研究的内在动力时,曾一度令人激动的新诗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向边缘位移,在“特殊”、“独立”的位置上,似乎愈来愈缺少与当下思想、文化对话的活力。在这种情境下,发现新的研究角度,扩张研究的领域,当然是必然的出路。近年来,新诗研究中一些新思路的引入,已体现出超越既有“范式”的努力,如对新诗流派与杂志传媒及城市文化的关系考察,从语言形式角度入手的文本细读,新诗经典化过程的考察,以及在主流的“现代主义”诗潮研究之外提出的“现代性”框架等,都从不同的方面,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但除此以外,对上述“范式”本身的检讨,也是应纳入考虑的工作。

其实,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任何范式、框架都不是可以脱离具体“使用”的自明性存在,其发生、展开总是受特殊的历史条件、语境的制约或鼓励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伴随着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摆脱,在某种抗辩的热情中,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品质也发生相应的转化,无论是历史的还原,还是对审美以及文学史规律的强调,都意在与原有政治格局的论辩中,建立起学科的自主性,而对纯粹“文学性”以及“文学现代化”的向往,也与当年整体性的历史逻辑相关。上述所谓新诗研究的“范式”,正是在这一背景中的,其活力和有效性,也是依托于当时的历史要求的。无论是对诗歌语言风格、诗人创作个性的关注,还是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现代主义诗潮的“偏爱”,都呼应着当时的整体性文化逻辑,可以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思想、文化自我建构的一部分,在强有力地“还原”了被遮蔽的新诗历史之后,崭新的问题空间也由此形成。

然而,当“范式”的合法性被充分认可并被广泛接受,最初新锐的发现,往往会被普及化为一种“常识”,而社会、历史以及精神氛围的变迁,又使“范式”得以存在的历史依托,渐渐失去了背后的现实针对性。由此而来的可能结果是,原本清新、尖锐的问题意识,会在学术的生产、再生产的环节中悄然流失,所谓的“范式”,也难免沉积、固化为某种制度化的“流程”。新诗研究“封闭性”的产生,与研究“范式”的这种沉积、固化,无疑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要重新唤起新诗研究的活力,能否在稳定的“范式”中引入反思的因素,将既定的前提、结论“历史化”,或许就是关键所在。

当然，“反思”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需要在新诗研究与当代文化变迁的重重纠葛中展开，而且“反思”不意味着“推倒重设”，某种整体性的“替代”，在目前的情况下，不仅是极其困难的，而且也是无意义的。从现实的角度看，更为有效的反思，还是应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只有通过一些具体的诗歌史问题的检讨，通过研究中思考角度的暗中更换，对既有范式的“抵制”或“改写”，才可能会更为鲜活地呈现，而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的研究所试图实现的。具体而言，“反思”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二

首先，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纯文学话语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关注文学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成为文学研究中被再三呼唤的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某种内在的矛盾也暗中发生。一方面，现代文学的展开，本身就是现代思想、文化、政治复杂建构的一部分，有的学者就曾这样说：“纯粹的美学兴趣当着遇到了如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对象，难免会感到了失望。这不是那种经得住一再的艺术探险的文学。”^{〔1〕}另一方面，通过文学的研究来探索人的现代化、文化启蒙、知识分子身份和使命等命题，这应该是一代学人研究的起点和抱负所在。因而，在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以及小说这样的“中心文体”研究中，虽然基于叙事学理论的形式分析一度十分时兴，某种由内而外、内外交错的现象常常发生。譬如，在赵园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中，“知识分子形象”似乎首先不是一个叙述层面上的形象学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精神结构”，一种“意识现象”来把握的，从中得到辨认的 20 世纪精神史、文化史的走向。由此一来，关于文学本体的内部研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更多停留在呼吁的层面，并没有被认真地落实。

然而，对于新诗研究而言，这种内、外冲突带来的“盲视”（或是“洞见”），似乎并不存在。在具体史料搜集和历史还原的基础上，无论是诗学观念的辨析、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还是传统与现代、西方影响与本土特征关系的把握，“内部”的审美研究，一直是新诗探讨的主要着眼点。不仅如此，“内部研究”也向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不仅传统的

印象式的审美感悟力,被看成是新诗研究者必需的素质,对复杂精微的形式、观念的敏锐辨析力,更是被普遍呼吁的能力。一方面,这与新诗本身的艺术成就和形式复杂性相关;另一方面,某种文类之间的等级,也暗含在其中。从“文学性”的角度看,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门类中,因为表意方式的独特和“纯粹”,诗歌似乎体现了文学性的尖端。因而,较之其他文类,“新诗”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诉求,以及在语言形式上的现代探索,它的文体独立性也更加鲜明。如果与同一时期小说研究不断向外拓展、容纳思想史和文化史因素的倾向相比,向某种诗歌“本体”的收缩,似乎是支配新诗研究的主要趋势。

应当说,这一思路的确吻合了新诗的文体特征和历史实际,研究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新诗的独特价值,也恰恰表现在这一方面。而且纯粹的内部研究,尤其是摆脱印象式的鉴赏,针对新诗文本形态的深入考察,目前还有相当大的空间。但可以追问的是,特殊化、纯粹性的趋向,与其说是具体的文体规约,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期待,一种受惠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制度性想象。与之相关的公共与私人、社会与心理、政治与诗歌、社会与个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则是现代文化的前提性结构。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与小说、戏剧等文体相比,诗歌似乎不适合于外部的社会学分析,因为其处理的更多是主观的、或情感方面的经验,如彼埃尔·阿瑟马在谈及“抒情作品的社会学”时所描述的:

许多理论家过去(和现在)认为抒情诗倾向于“主观性”和“情感”方面,几乎不适于进行社会学分析。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既不表现社会也不表现历史事件。它最常用的题材不是政治家、工会运动、罪犯或秘密组织,而是情人、大自然和孤独。^[猿]

如果一味地依从这样的制度性想象,是否会带来某种削减,暗中阻碍了思考、研究的自由扩张,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诗,作为新文学整体方案的一部分,其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忽略,它的生成与展开,同样处于 20 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在具体的“现场”中,新诗的传播接受、文化定位、读者样态以及文学史

塑造等等外部环节,与其历史形象和内在性质,都有着深刻的关联。单一的“内部研究”似乎无法将这些关联完全说明。其实,对所谓文学研究“内部”与“外部”之区分的反省,已经介入到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辨中,而对文学生产、体制等外部环节的考察,也正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如果将“新诗”放回这种整体的视野中,那么超越内外之别,打破“制度化”的单一格局,无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

其次,与内部研究的单一格局相关的,还有研究对象上的某种不均衡状态。20世纪 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前提的重设,那些能够体现所谓新诗的“艺术价值”,又曾一度被历史遮蔽的流派,诸如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九叶派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的“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几乎占据了目前新诗的主体。^[源]不均衡的状态,也表现在研究的时段上,譬如,相对于流派迭起的三四十年代,新诗发生的 90年代初,就似乎因为只具有发生、过渡的意义,而处于被冷淡的状态,较少被当下的主流研究涉及。当然,上文已言及,对“政治标准第一”的反拨和对文学现代化的向往,是这种研究趋向背后的动力。但有意思的是,在主次、轻重的秩序划分背后,某种划分的依据、尺度也被凸显出来。这一尺度,一般被表述为“诗”的标准。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宽泛的说法,表达的是一般读者对“诗”的特殊期待,比如诗境的含蓄、语言的优美、鲜明的抒情意味等,但应该注意的是,所谓“诗”的标准,并非一个本质性概念,它的确立既是一般审美期待的结果,也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塑造、规训相关。如果这一“历史化”的标准被非历史地使用,并落实为具体的研究、评价尺度,新诗历史展现的多种可能性,便有可能被忽略到中心的线索之外。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诗”标准的颁布中,某种“目的论”叙事也随之被暗示,即新诗的发展是依据一定内在规律,向着某种审美理想趋近的过程。在这一“目的论”叙事的支配下,从工具意义的革新,到纯粹诗美的营造;从形式问题的探讨,到内在体验的发生,从与传统的断裂到与传统的融合,从写实到浪漫再到现代,一种历时性的线性发展眼光,始终伴随着新诗研究的展开。可以说,对某种内在演进、辩证发展的逻辑的强调,已成为新诗史描述的一个主要趋向。^[缘]然而,需要追问的正是,

逻辑的展开能否等同于历史的本然,新诗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辩证规律,新诗史上共时的交错、偶然和矛盾,能否在历时的线性叙述中被有效呈现。正如韦勒克所称,在处理文学史上的“演变”观念时,“必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67]。在这个意义上,检讨新诗的相关历史叙事的起源,开掘在历时线索构造过程中,对复杂表象的擦抹,也就成了另一个反思的指向。

本书的研究思路,正是在上述两方面背景上提出的:首先,在方法上尝试绕开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既有模式,在新诗的内部研究“范式”中,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讨论,譬如发表、出版、读者阅读、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在一般的历史研究、审美研究中加入“经验研究”和文学社会学的因素,即“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即文本的生产、销售、接受和处理”^[68]。其次,尽量回到原初的现场,通过从共时的角度展现错杂、纷乱的历史表象,从而对一般的有关新诗的线性历史想象,提出自己的质询。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本书将讨论的焦点,投向在新诗发生的初期。虽然从文本成就上看,这一时期新诗的美学成就不及后来,但“新诗”的社会传播、接受模式,以及有关其合法性的历史想象,都在此一时奠基成形,其中包含的研究可能性,也要比一般理解的远为丰富。

三

上述言及的,只是方法上、时段上的一些设想,而标题“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就是本书“锁定”的话题。顾名思义,这项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研究的对象(新诗集),一是处理的主要问题框架(新诗的发生)。从“新诗集”的角度,讨论“新诗的发生”背后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内涵,就是本书想要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有关初期白话诗(或早期新诗)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最早有胡先骕、章太炎、李思纯、梅光迪、吴宓等人,对白话新诗的历史合法性进行质疑;继而,又有成仿吾、梁实秋、闻一多、穆木天等人,从新的视角出发,抨击初期新诗违背了“诗”的原则,这种攻击之声一直延续到当代,郑敏在著名的“世纪末回顾”中,更是将胡适等人推上

审判台。^[18]当然,在新诗史上,为初期新诗正名和辩护的声音也一直存在,朱自清、苏雪林、茅盾等人的言论就是其中的代表,1949年以后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评”之作,但其价值也更多地被定位在历史的开端和工具的过渡上,1949年代的诸种批评,已沉积成文学史的基本判断,即早期“新诗”虽然完成了语言工具、诗体形式的变革,但也造成了诗意的匮乏和诗美的放逐,后来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诗歌趋向的出现,才使新诗走上了艺术的正轨。从上述判断中不难看出,“新诗的发生”主要被处理成新诗的交替这一“线性”过程,无论是否定还是辩护,都在这一框架内展开。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作为“原点”的丰富意义,新诗发生内部交织的微妙张力,也有可能“流畅”的叙述中,被悄然抹平。

近年来,也有研究者试图突破上述框架。致力于新诗的“现代性”研究的臧棣就提出,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本身,已自足地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即从根本上说,新诗的现代性不是一个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而是要在传统之外提供一个越来越开阔的审美空间^[19]。这种提法的启发之处在于,一种虚拟的却绝对化的连续性,在他那里被拒斥,它将论述的重点移至新诗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上,从而巧妙地绕过了仅在传统与现代关系(或继承或反叛)中思考新诗前途的模式。这一提法同时也暗示了另一种考察角度,在历时性的断裂(或连续性)框架之外,是不是可以从一种“共时”性角度,展示“另一个审美空间”的内部构成。

当所谓的“内部构成”进入讨论的视野,一个关键性问题便凸显出来了,即“另一个审美空间”,不只显现在美学、形式层面,而是包含着更多社会、历史因素,也显现在一种社会建制的层面。新的美学可能的产生,与文学的生产、接受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正如伊格尔顿在谈到文学形式与生产的关系时,所指出的:“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艺术生产方式——是成千本印刷,还是在风雅圈子里流传手稿——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决定了作品文学形式本身。”^[20]从这个角度看,新诗现代性的生成,其“空间”的自足与独立,作为一项复杂的历史建构,是呈现于文学的现代生产、传播、接受方式的整体变迁中。在美学的变革之外,它还涉及到诗

歌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位置转移,以及社会传播,读者群塑造、阅读方式建立等诸多环节。这意味着新诗现代性这一话题,还包含了充分的潜力^{〔50〕},而追问“另一审美空间”的构造过程,也便有了另外的角度。

因而,本书并不着意从新诗交替的历时角度,审视“新诗的发生”,而是尝试如上文所言,从共时的层面,展现出新诗开创时期的复杂表象。同时,也不仅将“新诗的发生”只当作一场形式革命,而是采用彼德·比格尔在研究西方先锋派理论时所建议的视角,在具体的观念、事实之外,从“体制”的角度入手。因为“艺术作品不再被看作单个的实体,而要在常常决定了作品功能的体制性框架和状况之中来考察”^{〔51〕}。从体制或功能的角度出发,也决定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既有的观念检讨、形式分析之外,本书试图更多采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考察新诗发生背后的社会性因素,在审美讨论的基础上,恢复历史应有的深度。当然,作为一项社会、美学及文化的整体建构,“新诗的发生”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完整的历史还原,个人的研究能力既不能胜任,也不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本书最终所要完成的,是在回到历史表象的同时,探讨新诗发生的奠基性机制,或者用柄谷行人的说法,质询那种“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的“认识性装置”^{〔52〕}。在对“起源”的追溯中,新诗的历史图景,或许能够被重新认识。具体而言,研究的思路可大致如下展开。

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新诗的“发生”,是一批新诗人理论上的倡导和写作上的实验的结果,从胡适开始,对此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歌观念和写作的内部,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但还应看到的是,新诗的发生与成立,同时还是一个历史扩张与自我建构的过程,除了观念、形式上的变革之外,它还要在传播、阅读及社会评价中,建立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自足性的“另一个空间”。1954年出版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编者曾称:“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53〕}在这一经典性的论断中,新诗发生的整体进程得到了简洁的勾勒。

首先是观念上的鼓吹,“登高一呼”无疑是新诗发生的历史起点。然而,从文学的生产、接受和历史评价的角度看,新诗的成立至少还与

以下两个方面密切相关:首先,它是与社会层面的普及和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四远响应”,不仅表明新诗吸引了更多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新诗要在旧诗之外,形成一种新的传播、阅读和评价机制,而发表出版、读者群的形成,新诗坛的形成与分化,以及与新诗相应的阅读方式的建立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构成因素。惟其如此,新诗的奠基性“装置”,才得以完整确立。

其次,在新与旧的交替间,在特殊的历史冲动与现代知识规划的摩擦间、在新锐的文体实验与普遍的诗美期待的对话间,所谓新诗“正统”的成立,也是一个文学史形象的自我追寻过程,即在相关的历史呈现、批评及文学史建构中,如何完成“新诗”的想象,如何为自身建立起历史合法性。从“登高一呼”,到“四远响应”,再到“正统以立”,“新诗的发生”由是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

需要补充的是,在“四远响应”与“正统以立”的交织过程中,新诗“发生空间”的某种“场域”性质也得以显露。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或“场”)概念,正是时下文化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在布迪厄看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空间里,总体的社会空间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空间构成,而这些小的社会空间就构成不同的“场域”。因而,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场域),或一个构型(场域)”。^[1]每一个社会“场域”都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例如“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场域的”。在“场域”之中,每个参与者都参与着某种争夺,以期改善自己的场域位置,“强加一种对于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优化原则。而行动者的策略又取决于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即特定资本的分配。”^[2]对于“新诗”而言,作为一种历史的创生物,通过传统(现代、新)的二元对立,排斥其他的诗歌实践,从而开创“另一个审美空间”。这一现代性建构本身就包含着对新诗场域自足性的诉求,而在与既有诗歌惯习与诗坛格局的碰撞中,在自身的生长和纷争中,新诗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关系空间”。“正统以立”,亦即某种“新诗”自身的“特有逻辑和必然

性”的生成。借此,新诗“另一个空间”的自足性与合法性边界才得以呈现。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场域”的概念已被部分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10],本书也试图有限度地借用这一视角,在描述新诗“另一个空间”建立过程的同时,也探讨其运作、发生的特有逻辑,换言之,探讨其“正统以立”的内在含义。

应当说,上述几方面牵扯到的问题十分复杂(杂志上的发表,诗集的出版,读者的阅读,新旧诗坛的纠葛,相关评论的意义生产,乃至最后进入教科书,在文学史上完成自我定位等),“新诗集”只是本书选择的一个具体切入角度,对此有必要做出一点解说。

四

在新诗发生的完整“故事”中,“新诗集”的出版虽然只是情节之一,但从某种角度说,却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关涉到诸多方面的建构。作为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就曾对印行诗集的理由,作出过如下的说明:

我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很快很远,但是大多数人对于白话诗仍旧很怀疑;还有许多人不但怀疑,简直持反对的态度。因此,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一两种白话韵文的集子出来,也许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许可以供赞成和反对的人作一种参考的材料。第二,我实地试验白话诗已经三年了,我很想把这三年试验的结果供献给国内的文人,作为我的试验报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试验的结果,仔细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静气的批评,使我也可以知道这种试验究竟有没有成绩,用试验的方法,究竟有没有错误。第三,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事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11]

在这一段话虽然是胡适的夫子自道、个人表白,但“新诗集”最重要的两方面功能,也无形中被传达出来,即作为新诗作品的集结(“一种参考资料”),“新诗集”的出版,在传播上提供一种有效、集中阅读的可能,从而